

·文献学苑·

阿英的一篇佚文:《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

沈 虹 关家铮 (山东大学图书馆 山东济南 250100)

摘 要: 1936 年阿英刊发于《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的《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文,系统地总结了该年通俗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概况,对研究中国俗文学、通俗文学的学术史沿革,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阿英 通俗文学 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6-0109-03

A Lost Article of A Ying: Development of China Light Literature in 1936

Shen Hong Guan Jiazheng (Libra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China Light Literature in 1936, written by A Ying and published on Great Evening News in 1936, summarized general situation of light literature production and theory research in this year systematically. It supplied full and accurate material for research about China light literature and academic history evolution of China light literature. It has great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A Ying; light literature; folk literature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6-0109-03

阿英(1900—1977)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戏剧家和近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整理、研究近代文学,成为继胡适和鲁迅之后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阿英全集》,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浏览全集,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阿英是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阿英全集》的问世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阿英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推进对于上个世纪学术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阿英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分为12卷,500余万字。收入了现在所能搜集到的阿英先生的全部

著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创作,以及中外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话、史论和日记、书信。“值得称道的是,为了保存历史文献,全集对所收文章内容一律不作任何删改,包括一些现在看来不尽恰当的文章,也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保存语言资料,对当时的用语,包括标点符号,即使现在看来是不规范的,也不加润饰,为人们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学术文化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份翔实可靠的资料。”

全集求全,但遗珠散玉,在所难免。我们在翻检所藏旧笈,于阿英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中,发现了他的一篇文章,全集疏漏,未及收入。这篇佚文是《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刊载于1936年12月30日《大晚报·火炬

见《阿英全集》出版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5期,第15页。

《大晚报》副刊是由崔万秋(1903—1982)先生具体负责,主编副刊《火炬》《剪影》。(《上海新闻志》第十编 人物志 《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7)1936年该副刊《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版,则是由钱杏邨(阿英)具体负责主编。金性尧(1916—)先生当时在该刊发表过许多时事歌谣,笔者曾经去信,询问该刊的一些情况,金先生于2003年6月2日给笔者的信中说,该副刊的“通俗文学”版,就是由阿英具体负责主编的。抗战胜利后,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9月3日,赵景深(1902—1985)先生在《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第1期《复刊词》一文中说:“这周刊本是魏如晦(阿英)兄主编的,现在由我来继续下去。”另参见拙稿《阿英20世纪3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7-03-28;责任编辑:刘全根

通俗文学》周刊第四十期，署名：阿英。现全文照录文后，拾遗补阙，以飨读者。

文章刊发的时期，一九三五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运动席卷全国，而在这一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夏衍《忆阿英同志》）阿英在经历了参与组织太阳社，并作为太阳社的主将，致力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倡导革命文学后的深思，积极投身参加左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人和常委。他在参与编辑《拓荒者》《北斗》外，为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他还与夏衍等创办文艺理论刊物《文艺讲座》。同时，出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适应革命文学运动的需要，左联“展开了文艺大众化”问题、“通俗文学”问题的讨论。在这一大的背景下，阿英《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文，实际上是对于1936年“文艺大众化”、“通俗文学”等学术讨论的一点总结。郑伯奇（1895—1979）还写了《展开通俗文化运动》（《大晚报·火炬》栏目，1937年1月17日，第五版）；此外，在阿英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第6期（1936年5月6日）中，有顾仲彝（1903—1965）的《关于通俗文学的一个建议》一文，是对“大众化”的“新文学”的进一步探讨，也是针对郑振铎（1898—1958）《论通俗文学的整理》而作的论述。

总的来看，“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从其后的发展观察，更多局限于理论上的论述，没有很好的开展起来。关于“通俗文学”的问题，从内容看可以说是“俗文学”的研究。郑振铎的《论通俗文学的整理》，是对于俗文学理论的论述，指出：“我们的文坛向来对于通俗文学是最看不起的。戏曲、小说有系统的研究，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至于弹词、宝卷、鼓词以及民间歌曲的整理却还是最近的事——而且即在最近也还很少人着手。”文章最后对于整理研究俗文学，提出了一点想法：“第一，自然的搜集，有了多量的搜集来的资料在手头，方可以谈得到整理。第二是编目或作提要。这是进一步的工作，就搜集所得，加以初步的审阅及登录。第三是选择，从无数的平庸的作品里仔细的加以选拔，选出比较好些的东西出来。第四是将选择加以推荐或经翻印。使一般人民可以得到许多无毒的宏伟的读物。在一时新的读物未能多量产生的时候，比较无毒的旧读物仍是很需要的。”从《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文叙述的全部内容来看，也多半是属于俗文学研究范畴的，应当说这是本时期俗文学研究的小结。

附：

《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

阿 英

一般的说，中国通俗文学得到新的开展，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东北，炮轰上海，以及几年间理论上研究与探讨的启发，产生了不少的新的通俗作家。他们为着救国运动的深入，劳动层文学水准的提高，在大众化工作的实践上，采用了通俗文学的各种各样形式，做着很艰苦的文笔活动。虽然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地步，但成就已经是相当的可观。

最初从寂寞的环境中，来开始通俗创作实践的，是已经被难的易嘉瞿秋白。一二八战争期间，他在当时只印行了几期的《白话小报》上用“易阵风”的笔名，发表了不少的通俗作品，有五更调的《上海打仗景致》，有小说《英雄巧计献上海》。他用着极通俗的，以至于上海地方的语言，本质的说明那一次的战争，和英雄巧计献上海的经过。这是中国通俗文学走向新的阶段的第一声，应该永远在我们记忆中的事。

其次就是“中国新诗歌会”在一九三四年的新歌谣活动。诗歌会的机关志《新诗歌》为着新歌谣的提倡，特地印行了一期《歌谣专号》。论文方面，有穆木天的《关于歌谣之写作》、叶流的《略谈歌谣小调》，从各方面论证新歌谣创作的必要，及其方法。刊载了新的歌谣制作凡四十四题，选录了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浙江、云南各省的民歌、情歌、山歌，又复印了一种新的弹词“开篇”。次年“诗经社”印行《诗经》，也收印了不少。在一二八时代，大家还只是完全用着旧的形式，到这时却发展到从事于新形式的创作。

也就在一九三四年顷，新的歌与音乐发生了连接。本来为“毛毛雨”一类靡烂的音乐所风靡的中国市民层，也因着民族的自觉，开始厌弃那些旧的东西，对新的歌乐，表示了热烈的接受。施谊的《开路先锋》就是强有力的第一回的进军。这歌词配合了聂耳的刚健的谱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夺取了“毛毛雨”的阵地，奠定了新歌乐在民众间的基础。到了一九三六年，这一类的歌曲，是完全的成为了“大众的呼声”了。

一九三六年的通俗文学，最显著成绩的，是新弹词的产生。前年我们有过竹友的《新弹词》，去年也有安玉书的《陕西荒年》，但前者是弹词“开篇”，后者是鼓词“开篇”，所表现的力量是很微

《郑伯奇文集》《郑伯奇文集》编委会，西安：陕西文艺出版社，1988）未收入二篇文章；王延晞、王利编的《郑伯奇研究资料》中“目录索引”部分的《郑伯奇著译系年目录》中，把《展开通俗文化运动》一文误为《展开通俗化运动》；《建设新的通俗文学》（文艺论文）载1936年4月3日、4月8日上海《大晚报·火炬》。“其实，应为《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第1、2期。参见拙文《郑伯奇文集》补遗二篇（待发）。

弱的。今年却不然,除短小的开篇而外,还有成册的《国难记》和《走私》,且散播了很广大的影响。两书的作者都是董振华。在北方,也产生了《谈唱鼓词赛金花》,赵之中作,载《民众周报》。不过就已发表的看来,除第一回《有感时艰学政治清科举害,无心鬼混彩云嫁得状元郎》,写得还不差外,二回以下殊无可称。

董振华在这一年所写的弹词,除《国难》《走私》二书,还有《陈桂荣》《小烈士徐宝桂》《慈溪寡妇》三个篇子。这些都是在救亡运动的意义下写成的作品,叙述东北的失陷,华北的走私,及其他救国断片。他的目的,是如《国难记》结尾所唱:看了大家誓团结,团结起来好救亡。‘对争取 还没有自觉的民众’,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不过,也存在着缺陷。第一,是作者对于中国的政治,缺少本质的理解。第二,韵脚运用的范围太狭隘,重复处太多。第三,就是故事性还嫌不够,弹唱时不足以饯听众的要求。

不是一九三六年的特殊开展,而影响更广泛的扩大,在产生的量也更加丰富的,那是《歌曲》。读书生活社印行的《中国呼声集》,在很短期间,竟能销行到两万部之多,这是一个最有力量的证明。在这一年,施谊的钢铁般的歌唱,依旧表示了这一方面的最发展的力量。他写作了《四十年的愤怒》《工人救国歌》、《民族解放进行曲》《士兵之声》,三一八,五卅等纪念歌,而《上起刺刀来》,尤足称为几年来中国歌曲中最大的杰作,代表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铁一般的意志。吕骥的谱,和聂耳一样,表现了一种雄伟的力量,继续在扫荡着旧的乐歌的余氛。

通俗诗谣方面,也有很多的新成就,继续发展的,有陈子展、陶行知,新人有金性尧。陈子展的诗,多偏于政治社会的讽刺,和婉辛辣的笔姿,配合着平易圆熟的技巧,讽刺的深度往往是恰到好处。最足以代表的,有《孔夫子选女婿》《问孔》、《孔家店紧要声明》。陶行知的新作,以印成《知行诗歌集》。和他过去的作品一样,说理教育的成分较多,形式则仍近乎“歌”。文字的通俗,是迈过同时的作家的。可以作为代表的,有《送生活报日》《香港的印刷工人生活》《枪杆向北》《枪杆向外》。要说也有所失。那么,陈子展的诗,有时不免于概念,或者太激动了感情,这是对讽刺诗人不大相宜的。而相反,陶行知则太缺乏感情了,所以他的诗,称之为“歌”是较恰当。

金性尧在通俗诗歌方面的成就,是偏于“谣”。他用歌谣的体裁,讽论时政,批评社会,从事救亡活动,为大众叫喊,处处洋溢着兴奋了的青年的感情。代表的作品,有《飞机四字谣》、《名媛谣》《怀古新谣》《卖报谣》。另一篇《木刻 一个人的苦难 插歌》,开拓了“连环图画”注释的一条新路。其失在对政治

社会的理解太单纯,技巧亦欠熟练,瑕瑜互见,是往往有之的。

通俗的戏剧与小说,就这一年文学各部门的发展说,在量上是最少的。纯粹采用着新形式的戏剧,只有《放下你的鞭子》一种。这是极能抓住观众,已经获得广大效果,艺术价值相当高的剧本。作为遗憾的,是洪深的蹦蹦戏脚本《阎婆媳》,因演者在上演时改动得太多,随而不曾发表。小说可称的,只有董振华的《五四运动演义》一种,成为问题的,依旧是在故事性的缺乏上。“人物故事”产生的相当的多,特殊是在北平方面,但那些忠臣孝子歌颂的文章,究竟不能代表进步的倾向。

理论研究部分,重要的有顾颉刚的《吴歌小史》,李家瑞的《说弹词》,陈汝衡的《说书小史》,赵景深的《小说闲话》。顾作对吴歌形式的史的发展,作了一回概括的研究,李、陈二作,《说弹词》较为优胜,然亦不尽,陈作则缺漏殊多。赵景深对小说研究最勤,《三笑》《野叟曝言》等十余证,极足见其校勘的细心与研究的深刻。遗憾的是,三家的论证,都不及社会的根源。成就最多的,是关于蹦蹦,参加讨论者,远十余人之多,洪深蹦蹦戏剧本《阎婆媳 序》,尤其是巨制。指导理论太少,只郑振铎的《通俗文学的整理》,郑伯奇的《建设新的通俗文学》,茅盾的《关于民间文学》,张庚的《论乡村的戏剧》等数篇,反映了进步的倾向。沙梅从事音乐方面的研究,成绩亦不多。但这些,较之过去,究有不少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大体如此。这样的成就,当然不能使我们满足,但再进一步的向前,是只有待之一九三七年。这是未来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泉,前途的能以充分得到开展,那是必然的。希望作家们能广泛的来参加这一方面活动。还有不得不涉及的,就是我自己。《清平山堂话本》二种继续的发现,是较有意义的事。文笔活动,只出版了一册《小说闲谈》,完成了《晚清小说史》,发表了《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玉堂春故事的演变》《马如飞及其珍珠塔》《天花藏主人考略》,及近十万字的研究杂考。贫弱错误,凑数而已,要说成绩,是有难言。至一九三六年的佳作,其为我未见,本篇不及著录得,定然还有,见闻不到,也只是一致歉忱了。柳湜、崔万秋,在这一方面虽少写作,于推动是尽力最多的,这也是说本年通俗文学活动,我们所不能忘却的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四时)

作者简介:沈虹(1966-),女,山东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文献整理研究;关家铎(1957-),男,山东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中国俗文学学术史文献整理研究。

文章中的人名生卒年:瞿秋白(1899.1—1935)、穆木天(1900—1971)、叶流(生平不详)、施谊(孙师毅,1904—1966)、聂耳(1912—1935)、安玉书(生平不详)、董振华(曹伯韩,1897—1959)、吕骥(1909—2002)、陈子展(1898—1990)、陶行知(1891—1946)、洪深(1894—1955)、顾颉刚(1893—1980)、李家瑞(1895—1975)、陈汝衡(1900—1989)、赵景深(1902—1985)、茅盾(1896—1981)、张庚(1911—2003)、沙梅(原名:郑志,1909—1993)、柳湜(1903—1968)、崔万秋(1903—1982)。